

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示

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王义全 黄丽

[摘要]容闳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他认为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结症有三: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教育落后,三是外力入侵。其认识出自直观感受并亦不断深化,进而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为了实现他的爱国思想,容闳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乡村教育活动。其中派遣留学生是他最大的功绩,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技人才。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实践活动,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核心,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学子的赤诚之心。尤其重要的是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之路。

[关键词]容闳 教育救国 近代教育 启示

从16、17世纪开始,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发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东西方世界的差距愈来愈远。到了19世纪中叶,当西方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然而,中国依然是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的封建古国。一场规模浩大的鸦片战争就这样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一部分先进中国人的眼睛,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感到必须放眼世界,才能走出被列强侵略的困境。因此,以容闳、严复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出了国门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以寻求振兴国家的真理。而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成就是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之路。学术界多对他首创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以及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加以研究,或从边缘角度出发研究幼童留学“夭折”之原因,或从容闳一生的思想转变和心路历程来探讨他与中国近代的关系。在研究容闳的学者中比较著名的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喜所,他多对容闳与中美文化的沟通以及对容闳的晚年加以研究,而本文试图从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路线做进一步探讨,揭示其对中国近代教育之启示,以资今人借鉴。

一、容闳成长的个人因素

(一)勤奋好学,智慧超群,出色的完成了留美的学业

容闳在1847年随布朗校长去美国深造,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森学校学习了两年半,1850年毕业,并于秋季顺利的升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容闳在耶鲁大学是个异常刻苦的学生,他的勤奋好学在美国是出了名的。他说:“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晷为游戏运动”^[1]乃至能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考取这所名校。他的智慧和成绩也非常突出,在大学第二、第三两学期里,他的英文论说就两次获奖,使得“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2]。

(二)具有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之心和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

容闳19岁赴美留学,22岁入耶鲁大学,他是中国当时最早接触西方文化,随后又系统地接受西方正规教育的极少数人之一,他没有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背负的历史传统包袱。因此,他自幼年始即接受西方教育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他能摆脱中国传统及民族心理的束缚。^[3]然而容闳虽然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并完全接受了美国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美国只是“第二祖国”。因为在容闳到美国求学的历程中,亲眼看到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呈现的文明强盛,与腐败落后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容闳深感祖国的败落,于是便把在美国读书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当成是报国的一种力量储备,在大学时代便立志教育救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随着学业的进展,他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深感自身责任的重大,他说:“予当修业期间,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泱泱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之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5]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爱国热心和责任感,容闳没有盲目的屈从于外国,没有被一切金钱利益所诱惑,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等待时机报效祖国。正是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引发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对教育理论的探讨。正如韦特契耳牧师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演讲时对容闳的评价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6]

二、对祖国落后的三点认识

容闳对祖国贫穷落后乃至面临民族危机的认识,是逐步深入发展的。他18岁赴美留学以前,在家乡生活9年,再在澳门和香港读书9年,其在祖国的经历限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因此家乡的种种情形,已有初步的印象。后在美国耶鲁大学“修业期间,中国的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泱泱不乐。”这种感触显然来自他将原来的家乡印象与此时美国的见闻对比。归国后,祖国的情形逐渐使他形成了以下三点最主要的认识:

(一)政治的腐败造成了社会的黑暗

其一:1855年容闳在广州所见到的大屠杀。当时广东人民因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多处举行起义,两广总督叶名琛施以残暴镇压,一些虎狼宵夜趁机也敲诈诬陷,然而官府却不加审讯甄别,于当年夏天滥杀“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此事使容闳深受刺激,“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这次耳闻目睹的惨剧不仅使容闳初次体验到中国官吏的恣意妄行和政治黑暗,也为容闳后来到天京(南京)访问洪仁玕作了若干思想铺垫。其二:新事物的成长总会不是受到暴风雨的袭击。70年代容闳在操办留美幼童管理和调查秘鲁华工受虐待的情形时,尽心负责而屡遭攻击,而陈兰彬等“怯懦鄙夫”,“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反获升迁,这使他感到“政界中往往有如此不平之事。无功受禄转来不虞之誉;劳苦功高反有求全之毁”。其三:1896年容闳开办银行的计划被盛宣怀用贿赂权贵的办法破坏,更使容闳愤怒,称当时“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7]容闳于晚清弊政谈得并不多,但仅此数点就足以使他萌生并坚持政治改革的愿望。

(二)教育的陈旧落后造成人才的极度缺乏

容闳回国以后,重温祖国语言文字,深感中国方言之不统一及掌握中国文字的困难,进而感知中国国民多为“未受教育之人”,一般群众均“无知”、“迷信而顽固”。^[8]许多掌权者和欲干大事业者尽管接受过教育,但因当时的教育不“完全”,知识有缺陷,因而不能应对新的局势。容闳曾具体谈到他对太平军的观感,认为起义者从战士到领袖,宗教信仰和知识“皆甚浅陋而简单”,道德“乃每下而愈况”,“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画,实未敢信其必成”。^[9]谈到曾与自己共事、而暗中极力活动撤回留学幼童的陈兰彬时,容闳称这位翰林出身、曾任刑部主事垂20年的饱学之士“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10]故这种人必然排斥新知和反对借鉴他人事物。而在1898年中国讨论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时,以山东为势力范围的德国居然不准铁路通过该省,“中国国势孱弱,不能提出此问题,以争回固有之主权。而外交部中亦无人能引证条约,驳斥德国要求之无理,深恐惹起国际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听”。^[11]他认为中国在外交中任人欺凌愚弄,固然主要是因为国力孱弱,但缺乏国际法知识、缺乏外交人才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显然也是由于教育不健全所致。

(三)外力的侵入造成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容闳生存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外来侵略者所欲为。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昧于世界大势,又

作者简介:王义全(1956-),男,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黄丽(1986-),女,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实习教师。

缺少人才,在外交通商等各个方面中国丑戏不断。“在许多至关重要应由本国从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大权旁落。”^[12]由于科教的落后,封建统治者又固步自封,把西方先进的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大加排斥抵制。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国家一天天衰弱,任凭列强宰割。容闳对外国势力给中国造成危害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50年代末,容闳为了生计不得不为洋商调查和收购丝茶时,他的足迹曾遍历了中国的浙、赣、皖、湘、鄂等诸省,其感受是中国地大物博,地域辽阔,“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仅长江流域的物产和航运之利,就足以中外无数人口造福。他感叹“彼西人者,何不予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又如工人问题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非谓不当输入中国,第当逐渐推行,假以时日,俾人民得徐图他项事业,以恢复元气,不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13]其态度的软弱天真,可说溢于言表。1894年中日发生甲午战争,“战事既开幕,予之爱国心油然而生,乃连发两书,寄予友蔡锡勇君,……每书皆有条陈,规划战事,可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争,直至无穷期而不竭。”^[14]显然他是认为这次战争关系中国前途甚巨。但其结果又如何呢?中国不但失去了宝贵的领土——台湾,而且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到了1900年容闳参与其间的自立军起事和上海国会活动失败后,他曾明确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瓜分之局”,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远在美国的容闳已年高体弱,病卧在床,当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后,激动万分,在致国内革命人士的来信中,却仍不忘叮嘱全体革命者务必团结一致,称“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致外国干涉,这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他尤其担忧“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15]由此可见辞世不久前的容闳对列强的干涉中国内政和瓜分中国的野心,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三、倡导“教育救国”所做出的努力

“教育救国”论是近代中国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是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物。在放眼世界、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中,在探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是中华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而要缩小这种差距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教育,只有通过发展教育将西方文明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民族危机。于是,“教育救国”论应运而生,而容闳则是不仅开了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先河,更是近代“教育救国”论最有成效的实干家。就教育和培养人才的角度,容闳对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开创性的重大贡献,永垂青史而不朽。

(一)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容闳亲自察访,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政纲

“以西方之学校,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饶之境。”1855年,带着满腔爱国救国热忱回国后的容闳,怀揣着救国的理想奔走呼告,然而却处处碰壁。1857年,他一边在上海译书,一边通过一些社会名流结交清朝达官。这时太平军早已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并正式定都。太平军的干王洪仁玕曾旧居香港对资本主义了解颇多。1960年,带着“太平军之性质如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几代满州乎?”这样的疑问他和两位“拟作金陵游,实探太平军内幕”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了太平军首府天京,拜见了干王洪仁玕,并向他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立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级实业学校。”^[16]容闳的七条建议中就有四条是谈教育,可见教育在这位资产阶级改良家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他的建议和太平天国后期纲领文件——洪仁玕写的《资政新篇》基本吻合。但清政府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看成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的时代里,容闳还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作用,认为此革命“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觉醒,而有新中国之思想。”^[17]然而,这七条建议根本不可能实行。容闳建议的结果是:“又数日,干王忽遣使来,赠予一小包袱,拆而视之,则中裹一小印,长四英寸,宽一英寸,上镌予名,又有黄缎一幅,铃印十三。上书予官阶,曰‘义’字。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18]可见,容闳的一番苦心献策被太平军领导者理解认为是想加官进爵了,这也是封建主义压制资本主义的生动表现,很快的,容闳怀着的一颗失望的心情,谢绝了封爵和挽留,毅然离开了太平天国。虽然容闳与太平天国革命仅此一段关系,但他的七条建议的内容,是值得高度重视

的,他以后的多次设想和建议基本上都是这七条建议的发挥、深化和丰富。

(二)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力开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

洋务运动前,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已提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要求,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早期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辱。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官僚又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9]。此时普遍认为要“自强”必须先学外国的科技和军工,“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夺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0]。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1]。洋务派倡导的“洋务”,与传统的“夷物”有所不同,是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借此挽救清朝的同志。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也都一定程度地认识到科技与强国的关系,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但洋务派绝大多数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其思想观念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形成具有远见卓识的救国理论。而容闳则不然,自幼在西方受到先进的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切身经历以及美国的工业、农业飞速发展呈现的繁荣富强,都对他的科教兴国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所受的教育使容闳产生了科教兴国的思想,那么中国政府的腐败落后、外强的欺压则促使他下决心实施科教兴国的设想。为了实现他的科教兴国思想,容闳把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作为他实现目标的基石,他在译书、购买枪炮、办报、代为选聘“洋匠”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和贡献。

然而,他在洋务运动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首倡派莫过于就是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了,留学教育在容闳的教育计划中占有特殊地位,是容闳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核心,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容闳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大事业,亦报国之惟一政策”^[22]他在曾国藩准请“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后,自度“向所怀之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遂进而向已升任江苏巡抚的老友丁日昌多次“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又“恳其常向曾督言此”^[23]。及至1870年间,经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往返相商,容闳所提出的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终于获得奏准和实施。^[24]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端。容闳所倡导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作为中国人有组织的走出国门吸取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破冰之旅”,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举。虽然,由于清政府内部保守势力的攻击和作梗,留美计划于1881年被猝然中止,大部分学生“未能受到完全教育”而“凄然返国”,因此严重折损了这项计划的成效。尽管如此,这批留美学生在经过艰苦奋斗后,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军界、商界的知名人物,或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北洋政府中任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梁敦彦等。派遣幼童留美对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25]

(三)参与乡村教育活动,满足人们要求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

就在容闳留美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其实际就参与了乡村教育活动——倡议并捐资创办甄贤社学,然而这一事却往往被世人遗忘。我们前面已说到清政府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同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并由容闳主其事。但为了保证遣送幼童的质量,清廷在上海创办了一间预备学校,由全国各地选派聪颖子弟入校预读,优秀者入选赴美。出洋留学,对外语基础的要求较高,且背井离乡,很多家长不愿送子弟往异国求学,因而容闳负责的留学生选拔并不顺利。他在上海未能招满幼童出洋肄业局的第一批30名学生,于是,不得不南下香港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继续招生。在香港招收了詹天佑后,容闳遂以香山县为重点在家乡招生。因为香山县得风气之先,在外洋谋生人众,且子弟外语基础较高,所以,容闳返回家乡南屏动员侄子女容尚谦等人出洋肄业。“粤东香山县境之西有南屏乡,距濠镜四五里许,山峦耸峙,渊水澄回,允宜挺生异才,乡中聚族而处者约五千人,循古义宜设塾特无其人之为倡”。“容太守纯甫自沪旋粤,将岌岌有志于为是举,倡议在甄贤社的基础上办一间甄贤社学。“太守学既有成,因思有以教其乡之人,务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当时,容闳旧居已经破败,无法居住。他却不思整修自己的家,而搬去兆六容祠住,在那里与乡亲商讨办学。“所拟章程,集思广益,所筹经费,就众输贖,先之以履亩抽征,继捐之于富家殷户,务得其平,一乡之人,无不踊跃”。容闳以身作则率先亲自捐银500两,带动乡人集资,并得到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后来他又从美国寄来白银300两(一说为50两),最终促成甄贤社学于1872年开办。“其规模之远,度量之宏,固非仅取效于一时已也”。甄贤社学第一

次招生30人。到19世纪末期,甄贤社学扩展为四个分社,设在乡内容氏的盛茂祠、松隐祠、濠湾祠、良祖祠,每分社聘教师一人,学生总数逾百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洗礼后的大清帝国国民,深知“富民强国”的道理。要想国强,首先要富民,富民是强的前提条件。而要富民,又必须让人们接受良好完备的教育。因此,在创办“甄贤社学”筹集经费时,自然会“一乡之人,无不踊跃”的壮观场景。当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迎合了人们对接受教育的强烈需求和实现民富国强的迫切愿望。甄贤社学也一度“被清政府指定为培养选拔出国留学学生的学校。”容闳对甄贤社学的创办,不仅拓宽了归国留学生的服务领域,而且通过这次创办甄贤社学的壮举,给后来的归国留学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26]

四、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示

(一)培养人才,重振国威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

在近代维新思潮中,有一些仁人志士主张教育救国论。而这一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便是容闳。他计划“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使中国日趋予文明富强之境”,^[27]并认为“将使此老大帝国变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中国”。^[28]他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目的在为国家储备人才,他一直把这一计划作为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直到晚年他还把各行各业的留学生看做是建设新的民主国家的必备人才。他的办兵工学校的主张,蕴含着教育要为实现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工业,为培养我国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人才服务的科学思想。他提出建立面向人民大众的各级各类学校的主张。他还十分重视妇女教育,1894年奉命回国后,他倡导开放学校,使中国女子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并认为“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教育她的子女,由‘胎教’开始,好好的教育他们,这样他们长大后才能和外国人相比”,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列强欺凌,必须使妇女接受教育,从搞好家庭教育,提高子女的智力水平入手,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这些见解新颖精辟,思想超前,入木三分,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深刻的反应了我国要发展教育,重振国威,培养人才是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

(二)西学东渐,改革图强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必由之路

容闳的“西学东渐”教育计划是与他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的。当然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也为“西学东渐”的提出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容闳自幼接受西方近代教育,耳濡目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教设施等。中国到“十九世纪是教育腐败的时代”^[29],这一切使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与腐朽,自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在是否有必要学习西方教育的问题上,他批评了封建教育的劣根性,驳斥了封建官僚对外国教育盲目排斥的态度,主张用外国先进教育理念来改造本国陈腐的教育观念,谋求近代中国教育之出路。作为容闳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核心的留学教育也正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此外,容闳还身体力行的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余里”,^[30]直接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法律思想介绍到中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容闳关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想,不失为一种代表当时资产阶级发展新教育的先进思想,为近代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四育并举,和谐发展是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

容闳特别注重对国民的素质教育,他对中国传统的中庸无为的教育思想特别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与追求登科入仕的封建教育观不同,容闳通过自己受教育前后的对照深刻认识到,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修养,培养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敏锐地认识到教育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一切,即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重于财富。他还认为,教育的作用在“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格,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由此可知他强调了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容闳对留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也是非常的支持,认为青年人“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跳蹦蹦,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可以看出,容闳的教育目的和理想人才,既要渊博的知识,又要有高尚的品格,同时也注意体育锻炼,强调了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这种教育观念,为后来“五育并举”的提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也是近代教育发展的目标所在,从容闳的四育教育观念,我们也可得知只有和谐全面的发展德智体美,中国的教育才能健康的发展。

(四)实学为主,知行并重是近代中国教育的方针

晚清的教育体制十分腐朽,八股取士的教育体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教育制度。但重视教育一直以来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那时的教育目的是为了读书人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但是在读书人心中更深入人心的却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为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有通过读书、考试才能实现做官的梦想,并且这种思想已经被封建统治者和社会所接受。因此,千百年来,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传授知识技能,不是为发展科技,也不是为国家富强,而只是为封建制度培养官员。而对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来说,读书不是为学习一技之长,也不是为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而是为了将来能博得一官半职。^[31]容闳进入美国一流大学耶鲁大学读书后,接受了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学习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在美国的切身经历以及美国工业、农业飞速发展呈现的繁荣富强,这些都对他提出以实学为主、知行并重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鉴于西方实业教育之发达,成效之显著,容闳曾多次提出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他所倡导的兵工学校也着重“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他还提出把修建铁路与开办铁路学堂结合起来“凡测量、绘画、使车、制料等事均宜选聪颖子弟,以为造就人才地步”。在留学教育中最早的留学生所学习的科目也着重是船政、铁路、电报、制造等专业,学习方法是当时西方教育中特别推崇的注重实际操作。凸显实业教育,正是为了培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所需要的各种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对当时中国文人学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作用。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容闳不仅在教育实践上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中美教育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体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对打破封建教育伦理的束缚,开辟一代新风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

结语

总之,容闳以他自己独特的眼光,提出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后来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容闳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教育救国”和同时代的“实业救国”、“商战思想”一样,都是那个时代救亡图存的产物。这些思想没有注重政权的建设,不懂得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实施这些思想的基本条件。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及其实践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先进东西,尤其是容闳的“西学东渐”事业,促使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作为生活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容闳的思想、事迹至今乃令人钦佩不已。我们今天纪念容闳,重要的不仅仅是探索他对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而更应该去研究他怎样在国家社会变革时期勇敢的立于潮头,以个人的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勇于抛弃旧传统,不断学习、吸收新事物、新知识的智慧与哲学思想,以促进人们进一步研究容闳,宣传容闳。

参考文献

- [1]容闳.西学东渐记[M].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1(下省书名,只写页数).
- [2][4][6][7][8][9][10][11][12][13][14][15][22][23][27]同上,分别见于第21,23,22,104-105,120,62,89,62,60,57,102,120-121,11,45,114,40,135,121-12,23.
- [3]吕春红.论“容闳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思[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
- [5]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第一辑.第二册所附.吐依曲尔氏之演讲.
- [16][18]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团结出版社,2005.73,74,75.
- [17]容闳.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J].文史杂志,1995(1).
- [19]曾国藩全集.奏稿二[M].长沙.岳麓书社,1272.
- [20][21]筹办夷物始末(同治朝)[M].故宫博物院藏,1931.(25).1,10.
- [2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3-174.
- [25]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J].
- [26]张洪海.容闳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J].神州学刊,2006.10.
- [28]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45.
- [29]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
- [30]何广.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J].书目季刊(台湾),1979.
- [31]陈凤姑.容闳的教育目的论初探[J].北京邮电大学学院(社会科学版),2001(3).1.